# 再現的倫理：暴行攝影的痕迹美學

● 陳國森

## 一　暴行攝影與災難「再現」

1904年，瑞典傳教士丹尼爾森（Daniel J. Danielsen）發表了第一張關於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（Leopold II）及其政權的暴行照片①。攝影師在邦金達（Bonginda）傳教站拍攝了姆佩倫吉（Mpelengi）村一個名叫洛克塔（Lokoto/Lokota）的孩子，他站立在那兒，曲着自己缺損的手臂，一臉茫然。洛克塔被拍下照片時，距離他的手臂被英國—比利時印度橡膠公司（Anglo-Belgian India Rubber Company, ABIR）的民兵砍掉已過了五年。

在十九世紀末的「瓜分非洲」浪潮中，利奧波德二世將剛果盆地的大片土地攫為私人領地，並建立起所謂的「剛果自由邦」。利奧波德二世以人道主義為幌子，其政權通過強迫勞動、酷刑、致殘和屠殺等手段，瘋狂地掠奪當地的橡膠與象牙資源。對利奧波德政權暴行的最著名的記錄，來自英國傳教士、隸屬剛果—巴洛洛傳教會（Congo-Balolo Mission）的哈里斯夫婦（John and Alice Harris）。在1904年約翰．哈里斯所拍照片中，前景的男人名為恩薩拉（Nsala），他將手臂搭在自己的膝蓋上，赤着腳，也赤着身子，凝視着面前地板上一些細小的、石塊一樣的東西。背景中兩個剛果人站在邊緣，強烈的陽光使草叢與土路因過曝而發白，也使他們本就嚴肅的神情顯得更為僵硬。我們或許不能在一瞬間了解恩薩拉到底在看甚麼，為何他的沉思看起來會如此悲傷、痛苦——直到我們將目光移到照片的註解上：他注視的，是他五歲女兒被ABIR民兵殺害後剩下的手和腳。他將女兒的遺體帶到傳教站，於是便有了這張照片②。這些記錄利奧波德政權暴行的照片，後來在由哈里斯領導的歐洲巡迴演講上被反覆以幻燈片的形式播放，同時附有相應的文字說明，以便台下基督教背景的英美觀眾知曉剛果發生了甚麼，以及這種暴行還將繼續下去的事實。

對受難者的視覺再現（照片）意味着甚麼？它會喚起怎樣的情感，又會

帶來怎樣的倫理效應？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往往成為暴行攝影的理論與實踐的核心③。這裏使用的「倫理」(ethics)一詞取其最普遍的含義，即一種作為共同生活基礎的、關於諸行動應秉持的信念的集合。倫理規範指引我們應當在哪些規章和閾限中參與、行動，但並不對行動本身構成強制規定。倫理並不同於法律，我之所欲和我之所能是兩回事，而倫理指引前者。

時人評論剛果難民的圖像為「會灼傷眼睛的圖像，不該在任何情況下觀看或者展示這些照片」④；「帶來了一種近乎色情的視覺體驗」⑤。將暴行照片與色情(pornography)等同起來的看法在1960年代以後得到迅猛發展。以美國著名評論家桑塔格(Susan Sontag)為代表的文化批評者，將「色情」作為暴行攝影和觀看照片的體驗。她寫道：「只有戰爭攝影才同時結合了窺淫癖(voyeurism)與危險性」⑥，「所有展示對引人注目的身體的侵犯的圖像都是色情的」⑦。2010年海地地震之後，對新聞媒體上湧現的受災圖片是否有可能淪為「災難色情」(disaster porn)的擔憂也不脛而走⑧。2017年倫敦威斯敏斯特橋恐怖襲擊後，《太陽報》(*The Sun*)因大量刊載死傷者的照片，被指責為利用「災難色情」來謀取私利⑨。這些論斷背後的態度發展到今日，已使暴行攝影幾乎被等同為奇觀(spectacle)。可以說，每當類似的人道主義災難發生時，關於將受災者色情化的指責便會遍地可見。然而，這種反對「災難色情」的論調，很多時候僅僅是在全盤反對「再現」行為本身，卻忽略了再現的諸多層次與可能。當然，如此這般地引述桑塔格，看起來也顯得強詞奪理與簡單粗暴：它顯示了我們不加區別、直接地反對「災難再現」。

這種簡單化且趕時髦的「災難色情」的指控之所以無效或者應當被摒棄，不只是因為觀看和再現方式無法單靠語言論證和解決，還因為這種再現的倫理要求背後實則是對觀看主體的倫理要求，即要求觀者對「自己可能有罪」具備充分自覺意識；而上述「災難色情」論某種程度上恰恰是在倫理的意義上將觀者純潔化的嘗試：它試圖通過「不應去看」和「不應去拍」這樣的論調重塑一個無罪的觀者身份。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拒絕觀看反而是某種孱弱的表現。這並非是說對苦難暴行的再現不會成為一種暴力：當再現本身是對再現對象的工具化時，已然蘊含着某種程度的暴力；就此而言，世界上恐怕找不到一張完美的、倫理上無缺的暴行圖像。這也不是說討論其中可能蘊含的倫理問題是無意義的，因為對受難者的不公確實存在——即便是上述哈里斯夫婦拍攝的剛果暴行照片，又有誰敢說沒有傳教的需要和動機呢？

再如，美國著名紀實攝影師蘭格(Dorothea Lange)拍下了《移民母親》(*Migrant Mother*, 1936)照片，它已成為二十世紀最能代表人類面對苦難時的不屈的讚歌，但是有多少人知道這位母親的姓名？照片中的母親湯普森(Florence Thompson)，不僅對照片不具備解釋權，還成為了美國大蕭條時期苦難的符號。她本人抗議道：「我希望她〔蘭格〕未曾拍過我的照片……她說她會給我寄一份拷貝，但她從沒這麼做過。」如果我們僅僅依此認